

宋云彬杂文集



宋云彬杂文集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

一九八五年八月

责任编辑：秦人路

装 帧：曹辛之

木 刻：张家瑞

（《鱼乐图》）

宋云彬杂文集

SONG YUNBIN ZAWEN JI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
北京 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香港分店：域多利皇后街9号

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6.75印张 315,000字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3,000

书号7002·54 定价3.80元

序

—

经过十年内战灾难的折磨，宋云彬先生已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七日逝世了。他的身心交瘁，已经来不及想什么身后事，包括整理自己的文稿。现在，由于范用、朱光暄、欧阳文彬等同志的关怀，多方收集，得抗日战争以来写的杂文九十七篇，编成了《宋云彬杂文集》。夏衍同志和三联书店嘱我写一篇序。云彬先生家人也以此相托。虽然由我来写未必适当，但我还是接受下来了，于公于私，我都愿意作这件事。

我与云彬先生认识，是一九四〇年在桂林筹办《野草》的时候。他在《无题》里提到这件事，说是“夏衍先生……有一天约我去东坡酒家吃饭，……那一次我就认识了秦似先生。”那时我是二十二岁的小青年，他却这般郑重的称呼我，现在读起来是颇可惊讶的。后来，他在文章中又还提到“吾友绀弩兄”，“吾友秦似兄”，绀弩那时已是文坛健将了，我只是初见世面，就年岁而论，云彬先生长我二十一岁，还同我称兄道弟，未免有点滑稽。绀弩前年送我一本书，题款是“似兄不似兄”，末署“如弟不如弟绀弩”就是开的这

个玩笑。何况云彬较之绀弩，又大好几岁。我同他们，包括同孟超，都可说是忘年交。一转眼间，我已是六十七岁的人了，故人存歿，不能没有许多难于忘情的感想。

那时，在桂林一些熟人之中，云彬很有学者的风度，又有长者之风。我们都称他“宋公”，有时又开点玩笑，叫他“宋公明”。《野草》由五个人署名编辑，只要人在桂林，每期的稿件，是大家都要看一遍的。每轮到他看的时候，他总必正襟危坐，提着羊毫笔，咬着烟斗，一字不漏的看完。不论谁的文章，看到了有不妥的字句或偶然的笔误，他总要给改了才罢休。我往往就坐在桌子边，等着，有时他也感到我有点不耐烦了，但他还是坚持这样做。他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，使我肃然起敬。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，谈到南宋的事情，说是由于对金的不抵抗，最后落得陆秀夫背着赵昀跳下海去亡了国。他想了想，给我改了，添几个字，“后来蒙古人来了，南宋终于灭亡。”添的虽只有几个字，却使我感到写文章做学问是粗心不得的，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，至今不忘。又有一次，记不得是谁的文章，用了一个历史典故，他为了核对事实，当着我翻检开明书店出版的《二十五史》，足足翻了半小时。他的认真态度，大致如此。

我那时对于中国的学问和历史知识，还是个小学生，后来才读了几本历史书，写文章也颇爱谈到历史。这次重读云彬先生的杂文，才知道他对中国的历史是下过一番苦功的，称得上是有研究，有见解的。在这个集子的几十篇文章里，处处可以见到他的工力。比如，他说叔孙通道貌岸然，其实

也颇搞一点权术，是儒者而兼策士之流的人物，并说司马迁对这一类人（包括苏秦、张仪）是不怎么看得起的；又如，他说陶渊明不仕刘宋，不书刘宋年号，那是因为对“万里气吞如虎”的刘裕，把统一南北的国家大事抛弃了，只热中于去篡夺政权当皇帝，陶渊明是特别不满的。类似的议论和独到见解不少。可见云彬先生不失为一个治学谨严的学者。

“中国目前充斥着曲学阿世、冒没奔竞之徒，而缺少脚踏实地、从事学术研究的人。”（《回忆许地山》）他说的那个“目前”，指的是三、四十年代。这当是很有所感而发的吧。象云彬先生者，是有资格发这个感慨的。

二

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人有强烈的是非观，才去写写杂文，还是并不一定如此，也可以写。但就云彬先生说，我觉得确是有不得已于言者，才去写杂文的。

一个人要怀有强烈的是非观，也并非易事。庄子不云乎：“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”，还是混沌为好。中国有“不为天下先”的古训，还有口不臧否人物的信条。那样不会得罪人，也省去很多事。云彬先生虽然也读了许多古书，但却似乎不受这方面的影响，反过来要言天下事，论古今之是非。作为一个历史或训诂方面的学者来说，这一点正是很为难得的，我以为。

上面说过，云彬先生是研究历史的，因此他的杂文，无论谈论时事、褒贬人物，总是贯串着历史的观点，带有

历史的眼光。他什么时候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，我不知道；但从抗战开始，可以看出，他是极力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指引自己的。那并非为了时髦，而是他的信仰，他已经把自己做学问和学习运用唯物史观结合起来了。尽管还不能说他已精通了唯物史观。

他在抗战初期写的一系列杂文，几乎完全集中于一个主旨，那就是，中国人民要奋起抗战，要反对日本的侵略，反对世界法西斯。但他并不是光讲几句空口号，而是从历史的前进或倒退来着眼的。而且，他的文章是有对象的，他并不担心一般人民大众会消极抗战，可是对于一小部分“读书人”，尤其自以为博古通今，却逃避抗战的现实，还躲在什么斋里头讥笑抗日青年如何浅薄，甚至丧失民族气节，敌我不分的所谓学者名流，云彬先生是不惜一再劝谏，痛加针砭的。他从南北朝士大夫有人教子弟学鲜卑语、弹琵琶，以备服事“胡贵”的丑态，一直讲到《桃花扇》，从吴梅村一直讲到王国维，都是环绕着这一主题。对于当时在重庆和昆明两地，有一些所谓《战国策》派的教授先生，竟大唱“德意路线”，公然为国际法西斯张目，云彬先生更是严加笔伐。因此，他的杂文是有所为而发的，并不是无的放矢。

对比之下，云彬先生赞扬了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一些学人，比如章太炎就是其中一个。章太炎是极力要“严夷夏之辨”的，云彬就以这个观点来指斥那些不分敌我的人。连杜甫称赞过的“暮年诗赋动江关”的庾信，也在呵斥之列。单拿“夷夏之辨”作论据，是与时代不相适应的，因为那时中

国人民所面对的已经是国际法西斯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，不是历史上的南北分峙或中国民族内部之间的问题了。这一点，云彬也是意识到了的，他虽也一再使用“严夷夏之辨”这句话，但他指出章太炎只不过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。尽管这样，云彬这些很有针对性的杂文，在当时是写得相当深刻的，也表现了他的强烈的是非观；并非从什么个人偏见出发，而是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的。

云彬先生进一步认为，作为知识界人士或学者，处在国家存亡之际，能做慷慨牺牲的烈士比做保持名节的义士更为可贵。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，他对于章太炎的弟子、以研究《易经》《三礼》著名的吴检斋先生，竟能走出书斋，领导青年学生抗日救亡，以至在平津沦陷后坚持斗争，死于侵略者屠刀下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早在一九四〇年，他就有过怀念在沦陷区死生未卜的吴先生的文章，在《野草》发表，此后一再提到吴先生，都表示十分推崇之意，可见他正是把吴检斋看做鲁迅所说的“中国的脊梁”式的人。他问道：太炎先生的弟子很不少，有几个能象吴检斋的？他说，章太炎当年对不肯反清的俞樾，写了一篇《谢本师》，而吴检斋的冲出儒家那一道与人民隔绝的藩篱，走上革命的道路，实际上也等于给晚年与人民隔绝的章太炎写了《谢本师》。作为一个学人，云彬发出如此旗帜鲜明的议论，在当时确是难得的。

由于这样一个进步的、革命的立场，因而对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重庆较场口事件，先后

在昆明枪杀李公朴、闻一多的事件，云彬先生无不义愤填膺，发出公开的抗议。李公朴事件发生后，他一得悉，即愤不可遏，竟迫不及待，仅征得柳亚子先生同意，便二人发出了慰问电。

云彬并不是共产党员，但作为一个从旧垒中来的知识分子、学者，他从思想认识到言论行动，都是值得我们赞许，值得我们纪念的。他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，可说是同心同德，一贯无保留地给予支持的，在他身上，真有着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精神。不是说“肝胆相照，荣辱与共”吗？这八个字，从当年云彬先生的表现，可说是当之无愧了。

解放之后，云彬没有什么很高的职位，他只是住在杭州，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。其实，这工作对于他是未必适合的，但他服从分配，十分安心。到了一九五六年前后，对于诸如有些干部搞浮夸风，搞一言堂，公然破坏文物，轻视知识文化等等“左”的流风，云彬又有了不能已于言者，在一两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点意见。不料竟以此贾祸，被划为“右派”，从此以后，很长一段时间再也看不到云彬的文字，听不到他的声音了。“哀莫大于心死”，这不仅对于云彬为然的。他的内心有着怎样的痛苦，我们是可以想象的。

三

云彬先生的高风亮节，表现在他的为人方面，也有许多值得谈谈，令人回思难已的事情。

他虽然有实学，但却从来没有摆什么学者的架子。他从来从不讥笑青年人的浅薄，相反，对青年人总是采取相信、鼓励、爱护的态度。大概是一九四〇年前后吧，那时他在广西文化供应社编辑部工作，编了一本《鲁迅语录》，开始很受欢迎，因为鲁迅的书，那时的青年人真正读过的还是不多的，那本《鲁迅语录》起到了向青年人介绍鲁迅思想的作用。可是，不久问题就来了。有一个颇为“左”得出奇的青年，给《野草》投了一篇稿，指责这是对鲁迅的阉割与剽窃，是一种“市侩”文人的行为。我不想压抑别人对《野草》同人之一的云彬的意见，于是主张给予发表；云彬对此也非常坦然，他说：“发表吧。”发表之后，我问他要不要作公开的答复，他摇摇手。我知道他并不愿意去挫折一个虽然有点过分，但本意还是追求革命青年的心。

云彬虽然也写杂文，还是桂林旧文协的常务理事，但他一再说他不能算作家；他还写过一篇《辞“作家”》，其中固然有他世故的一面，但那谦虚的态度是并非矫饰的。他反对以专家自命，去吓唬别人，比如说，有人把版本学吹得神乎其神，他就写了一篇《我也谈谈版本》，指出懂得一点版本学就自炫其高深，是可笑的。

云彬先生待人接物，很重视真诚两个字。他既不持才傲物，也不阿谀讨好别人，包括一些权威名流，他都不肯违心地去讲一些无聊的吹捧的话。有时还敢于讲出一点善意的批评。由此可见，他是真正倡导批评自我批评风气的。他持这种态度，数十年如一日。甚至以此得罪了人，他也

不悔。我以为这种精神也是值得学习的。鲁迅反对“捧倒”与“骂倒”，云彬实行朋友之间提倡善意的规劝，那用意是一致的。

由于云彬的这种耿介性格，他在桂林那几年，也曾经受到过同营垒中的人的误解和攻击。《鲁迅语录》一事之外，还有后来到了保护作家权益会议之时，文艺界颇有人疑心他站在出版商的方面的；这事已有他的文章辩白，我就不谈了。在这里，我只想说我本人对他也有过的误解。那就是也正好发生在那个时候，《野草》得罪了某报，竟受到出版者的压力，以停印相威胁的那一段公案。那时有流言，说出版商提出以宋云彬代替秦似任责任编辑为条件，才肯继续出刊。后来由于文艺界的抗议，《野草》终于照原样继续出刊了，我并没有同云彬敞开心谈过有无要以他代我的事，他大概由于那时关于他与出版商如何如何的说法颇多，也正处于难于自辩的境地，所以也没有向我解释过。为了这事，我心里生过芥蒂，终于在一九五八年我的《没羽集》出版时，在《前言》里对他进行了笔墨相讥。后来才觉得，那时是他被划“右派”，正是心情极其难受的时候，我的所为，无异于下井投石的，也就悔之莫及。这是我生平对待朋友最于心有愧的一件事，一直感到内疚。一九六三年我在北京与他重逢时，我首先对他表示深切的歉意，他却毫无芥蒂的说：“那是小事，没有什么，再不要记它了。”云彬先生的容人之量，使我不能不感到惊讶。他多次在文章中说“朋友毕竟是朋友”，他与那种斤斤计较个人恩怨而不惜勇于内

战的人的态度，是很不同的。

现在看了云彬的文集，他对那个“某报”也是批评过的，决不可能受人利用。

我不是基督徒，也不准备忏悔。但在大家都处于受折磨的逆境之时，我竟以未被划“右派”的身份，向曾经是师友的云彬表示白眼了，这同阿Q与王胡相骂，何其相同！我从这里发现了我也有过这样一种可耻的劣根性，虽然云彬原谅我，我是难于原谅自己的。

四

一九六三年我到北京，是到北大去进修音韵学。那时，恰好云彬先生已迁到北京来，住在翠微路中华书局宿舍，并且每周到北大历史系讲两小时课。讲的是《史记》中的《天官书》。《天官书》我没有读懂，很想去听听，但可惜时间不足，终于没有听成。

关于我去学音韵学，当时颇有人以为诧异的。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当我去看他时，他对于我来北大进修一事十分不以为然。他说，你忘了自己的身份，简直是太叫人感到出奇了。后来我才记起，杨晦当年也给《野草》写过稿的，他这样看，也确乎出于对我的爱护之心。但云彬对我的来进修音韵学，上课堂同青年学生一道听课，却并不认为是什么丢脸的事。这大概由于，他已十分了解，我是做不成什么作家的，倒不如学点东西为好。再则，在那样一个时候，也只好如此吧。就是夏衍和绀弩两位，态

度也相同。我要写一本《现代诗韵》，就得到夏衍同志的鼓励和支持。

君子之交淡如水，这是云彬说过的话，而他，也确实是如此。有一天，我忽然收到他的一封信，说是端午节到了，约我在那天到他家吃午饭。并说明不请别的客人。我如约去了，那天他一家都非常高兴，宋师母亲自做菜，云彬拿出他平素喜欢的绍兴黄酒，高高兴兴地和我对酌。饭后还下了两盘围棋。那一天谈得很多，话旧之外，就谈历史学，音韵学。只有不谈政治，他对于五七年以来的遭遇，似乎全忘光了，一句也没有说起。直到晚上我才告别，他的儿女送我上公共汽车，他还嫌不够，还要亲自送我。从他住所到公共汽车站，约有两里多路，他非送到那里看我上了车才回去。此后我还去过一两回，他也每次如此送我。

不久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。我们分处南北，音信隔绝。当我在红卫兵印的所谓《百丑图》中看到熟人夏衍、田汉等的照片，心如刀割，惟独绀弩和云彬的消息，一点也不知道。后来来了一个外调的，查问我宋云彬在一九四六年到桂林设法营救我，有无其事。我无以回答，因为连我也不知道有无其事。云彬先生也没有同我说起过。大概由于别人追逼供讯，说他那一次重返桂林是与桂系搞什么活动之类，他才说到与访查我的踪迹有关。这是很可能的。据云彬先生女儿宋蕴庄女士最近告诉我，一九四六年云彬的确去过桂林。那时也的确正是盛传我被捕入狱的时候。其实我并没有被捕获，要真被捕，在那个“非常时期”是就地枪

决，也不可能坐牢的。这些事当然不是云彬可以想到的了。那时象柳亚子、田汉、绀弩等许多人都关心我的死生，云彬自然也是关心的，他的到桂林至少也有想打听一下我的消息的目的。却想不到连累他又多了一个受审的题目。

“文革”以后，直到七〇年，我因编纂《辞源》的工作到北京，才又见到云彬。他是从湖北咸宁回来的，在那儿，扛大粪走不动，被踢倒在地踏上一只脚，是经常的事。他那时已七十多岁，身体又不好，便病倒了。幸亏蕴庄女士千方百计，才设法接他回北京治疗。但从那时起，他虽还勉力做着标点《二十四史》一些未了的工作，却是沉默不语了。我去看他时，他也总是呆呆地望着我，咬着烟斗，一言不发，竟象得了喑哑症一般。据蕴庄女士说，从咸宁回来直到他逝世，整整九年闭口无言。他曾对蕴庄说：“我胸口有三扇门，紧紧锁闭着，再也打不开了！”

拨乱反正后，云彬先生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，由他的孙子搀着参加了一次会议。但不到半年就去世了。他胸口的三扇门，我虽然不知是什么样的，但我相信，要是他活到今天，看到中国又一次有了振兴的希望，忠于祖国和忠于人民的知识分子终究受到应有的尊重与信任，他毕生所愿望的，中国走上昌盛富强的道路，正在一天天变为现实，他胸口那三扇门是会打开的。

可惜云彬尽了他的历史任务，已是长眠地下了。

1984.12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



宗雲彬

漢霸姑朱居侯劉章曾任跟呂太后合過一宵朝田歌，
耕種，立苗稀疏；非其種者，鋤而去之。他除這首歌，
是別有圖志的，借此來表示反對呂氏專權，要把姓呂的（非
其族者）都排斥出去（鋤而去之）。這首歌並非創言
杜撰，當時流行，它是當時農民對水禍新作的生
動總結。

蘇同姓歌，漢耕種歌就是我們現在親身深研考
這，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就是鋤去奸邪。但什麼叫「立
苗稀疏」？卻不大好懂，既然要密種，為什麼又說「立苗稀
疏」呢？這有點難，我最近在蘇州聽一種田状元談來
康漢怎樣種和怎樣省地時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漢朝人
說的「立苗稀疏」，就是種的時辰谷子落片後疏而
種勻，大概一個銅錢那麼大範圍只種三粒谷子，這樣
一般秧田人家要產谷一兩五十斤以上，沈承康只產九十斤
左右就減了。不但省了糧食，並且讓秧苗茁壯，到插
栽的時候已有三個分蘖了。因為秧苗育得好，插秧的
時候三四枝秧苗，通過合理的密植和合理的施
肥，連連田間管理，一畝田收穫一千多斤谷子是沒有問題

目 录

序	秦 似 1
我也谈谈版本	1
谈读书	4
一 从焚书到读书	4
二 好读书，不求甚解	6
所谓“倭寇”	8
从学鲜卑语讲起	10
没落了的策士	13
杂谈两则	15
一 雅与俗	15
二 美和丑	16
杂谈三则	19
一 检陶	19
二 贬庾	21
三 呵周	22
谈气节	25
从生死问题谈到人生态度	30